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美国、韩日等为中心，比较分析不同时期的外来文化接受情况-以政府官方文件和《人民日报》为中心

党启蒙[1]*

[1*]传播学院,国民大学,韩国

摘要

本研究考察了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模式。通过比较分析政府官员文件和《人民日报》的报道，主要聚焦于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方式是如何从以苏联为中心（1949-1969 年）、以美国为主导（1978-2000 年），再到以东亚为重点的文化交流时期（2000 年至今）的转变。该研究采用了对两个主要数据来源的内容分析:1.政府政策文件；2，跨越七十年的《人民日报》报道。研究框架采用三角测量方法，结合了意识形态控制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和文化杂交理论在内的多种理论视角，以确保进行全面分析，并开发了关键编码类别被以识别不同时期的文化接受模式、特征和限制。

关键词:*外来文化接受，文化接待，跨文化交流，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杂交，文化接近性*

Doi: 10.63802/jlpcs.v1.i1.57

引言

已有的研究显示，中国最初接受外国文化的特点是以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策驱动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这一时期通过官方渠道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的教育体系、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框架。接受模式高度集中，由国家控制，并且由于冷战的限制，仅限于社会主义集团国家。

美国文化时期（1978-2000）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该研究记录了向以美国资本主义文化为主导的市场导向文化接受的转变。这一时期见证了好莱坞电影、快餐连锁店、流行音乐和消费文化的繁荣，从根本上用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挑战了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接受机制从政府强制转变为消费者选择和市场力量。

东亚文化时期（2000 年至今）

当代阶段展示了以基层为导向、以青年为中心的对日本和韩国文化产品的接受，特别是通过数字媒体平台。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文化混杂，将传统的东亚价值观与现代流行文化元素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本地化文化形式。然而，这一时期也揭示了政策干预的增加，例如 2016 年的"韩流限制令"（限韩令）。

该研究识别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接受机制:政策导向（苏联时期）、市场导向（美国时期）和流行文化导向（东亚时期）。每种机制都展示了独特的特征、传播渠道和社会影响。研究显示，中国的文化接受过程越来越强调本土化和适应，而不是全面采纳。

分析揭示了每个时期内在的局限性:苏联时期的文化同质性、美国时期的过度商业化以及影响东亚文化交流的政策敏感性。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的对外文化接受程度已经从被动、受限的接受转变为主动、有选择性的适应，越来越重视文化安全和国家认同的保存。

这项研究期待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保持文化主权的同时应对外国文化影响提供关键见解，同时为理解非西方背景下当代文化全球化的动态提供理论框架。

文献综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向世界宣告这个古老的国家开启了新的篇章。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开始了，从封建社会转向中华民国，中国社会发生了迈向现代化的社会变化。传统的生产方式、制度安排、生活方式等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文化认同也面临现代性的冲击。这种古代和现代的变化在秩序观中尤为突出。过去几千年来，中国熟悉的“天下体系”转变为西方近代的“世界体系”，传统的“中华夷狄”观念不再具有现实解释力。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这意味着中国开始从过去的“天下中心”转变为“万国之一”。（李扬帆，2014）.中国现在意识到，自己的文明不再是东亚国家"前方的明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已经深知自己文明落后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东亚儒家文明国家的文化输出者，现在必须转型为谦虚的文化接受者，这种反转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变化的痛苦。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就已经察觉到自己的落后，开始积极接触和学习西方文化，甚至在民国时期的街头，都有“可口可乐”的广告和宣传海报。当时主导市场经济的美国代表性跨国企业之一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 Company）被共产阵营视为象征美国的“资本主义尖兵”，成为代表美国的象征性企业（金德浩，2005 年）。可口可乐代表着美国的民主，自由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这也是现代中国开始接触到世界的第一次尝试。但随着“国共内战”的失败，蒋介石带着以资本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国民党政府中华民国一起逃亡到了台湾，也标志着资本主义价值观在中国本土大陆上的一次失败。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逐步开放与世界接轨，外来文化开始逐渐渗透到中国的各个方面。与国际接轨，推动全球化进程，也是中国作为“地球村”一份子的重要任务。外来文化的引入的不同阶段为中国带来了思想观念的解放和多元文化的交流，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文化冲突和适应性的问题。

所谓外来文化是指正在进入一个民族内部，并与其社会发生作用的别族文化。其形态存在于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各方面。如外国书籍,外国电影,外国科研成果,外国教育体系方法,外国风俗习惯等。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相对，外来文化作用于本地文化的过程既是文化入侵的过程，同时也是同化和改造的过程。无论外来文化形态如何，其对本地文化均会具有一定的冲击和影响（百度百科）。

本文将中国的外来文化受用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新中国 1949 年成立之初的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受用时期，还有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中国的代表资本主义思想的美国文化受用时期，还有 1992 年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改变到现在的全球化以及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脱近代的文化受用“时期(李昌贤,2005)。从不同时期的外来文化传播背景、影响、接受形式和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多个角度，以及各个时期外国文化受用结束的原因，从局限性和背景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分析新中国各个时期在外来文化方面的受用情况。

不同时期新中国文化受用情况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受用时期

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又处在二战与“国共内战”刚刚结束的伤痛之中，在经历这么多苦难之后，中国人民决定推翻之前的一切被“封建主义”，“被帝国主义”

统治的过去，所以就掀起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在这种经历过各种战争的背景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决定推翻一切之前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刚刚战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体制。毛泽东认为这三种体制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所以与这三种主义相关联的文化都要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两国关系紧密，苏联成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重要盟友。文化交流也是这一时期的重点，苏联文化被视为中国发展的榜样，尤其是在工业化、科技和教育等方面。

苏联教育体制的引入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的“专业学院”模式（如工科、师范、农业等）被大量借鉴，并影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苏联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和工业科技，也在这一时期广泛传播。这种教育方式和工业化技术成果的交流是以官方政策和制度为载体传播。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许多文学作品、戏剧、电影等以“工人，农民，军人”为题材，强调集体主义和革命精神。苏联的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在中国广泛流传，成为教育和宣传的重要工具。在电影方面，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早期的中国电影常借鉴苏联影片中的革命和战争题材，塑造具有民族精神的正面角色，强调社会理想和集体利益。

由于当时处于冷战的时期，世界处于社会主义联盟和资本主义联盟对立时期，所以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能选择引进的外来文化也仅仅限于苏联，阿尔巴尼亚，东德，越南，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而在那个时期这些国家和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虽然能够接触到外来文化，但比起现在，当时中国的文化受用选择还是非常少的。这种文化受用是被时代背景和国家体制所限制得。

同时,苏联文化对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有较大的影响。建国之初到 50 年代末,在形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社会文化过程中,苏联文化对中国有较大的影响,中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大量引进苏联的经验；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尽管中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严重扭曲,但主流仍然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和苏联的模式,集中表现为重精神轻物质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高培业,1998）.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来文化由中国政府领导，从中央向全国扩散，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艺术以形象的方式组织社会经验，创造一致的情绪、统一的集体精神，教育民众（李金花，2020）。形成一种自上而下外来的文化传播并受用的方式。

总结来说，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受到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外来文化的影响进行了第一轮文化受用过程，这种文化受用方式是通过国家主导的自上而

下引入，特别是在教育、科技和文艺领域，以官方政策和制度为载体传播。而中国国民的文化受用过程是被动的，有限制的，以社会主义国家思想为中心的。

随着中苏关系在 1969 年恶化，中方逐步减少对苏联文化的依赖，文化上的交往和学习趋于结束。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也因过度强调苏联模式而忽略了中国自身的文化特点。所以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都陷入国内的阶级斗争之中，这可能也是受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中激进的左派思想部分影响所导致，不光忽略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还阻碍了中国将近 20 年的经济发展。所以虽然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受用时期已经结束但是影响深远，让现在中国的“寄生时代”还留有革命与战争的痕迹。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受用时期

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国内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受到了重创，认识到国内局势十分严峻的邓小平积极需求改变。首先拨乱反正结束了灾难般的文化大革命，把国家运行的重点从国内的阶级斗争转为寻求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方针。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这句话也暗示着中国开始接受不同的经济和对外政策。

另一方面，1972 年，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谈判，使中美两国于 1979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交，从而结束了长达 30 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百度百科）。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逐步与西方国家恢复和发展外交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为接受美国文化打开了大门。美国文化的强势输出与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形成了契合，尤其是在消费文化、教育和科技领域，美国文化影响深远。

在消费文化方面，美国的流行文化通过电影、音乐、电视节目等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好莱坞电影、摇滚音乐、流行歌曲、以及美式快餐（麦当劳、肯德基）逐渐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一时期，美国的消费主义观念也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1987 年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开业，不少市民在肯德基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就为了能尝一尝这传说中的“西餐”。虽然在美国肯德基这种快餐是平价且普通的饮食，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肯德基代表着价格高昂的西方饮食和追求流行的象征。当美国的音乐和电影通过电台与电视机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时候，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和新鲜感。因为美国文化推崇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理念,是美国社会文化的最显著特征。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利益,重人性中的个性,而轻共性;崇尚个人意志、利益高于集体规范、集体利益；鼓励个人的行为有较大的选择自由（高培业,1998）。这和之前所接受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所代表的集体主义思想完全不同，许多年轻人认为之前的思想束缚了个人的思想和自由，所以中国年轻人在享受

这些文化产品带来的乐趣的同时，美国自然而然的成为了 80 年代年轻人先进和自由的象征，憧憬着能够去美国看一看。

大量的年轻人都怀着自己的“美国梦”，向往着去美国奋斗去追寻自己的梦想。美国梦也推动着中美之间的教育和科技交流更加频繁。大量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带回了西方的学术理念和科学技术，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管理理论等领域，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学习对象。中国首先在 80 年代送出 5000 名公派赴美留学生。由国家公派留学再学成归来，是中国人最早留学美国的主要路径。这一时期，留学学科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主并兼顾其他，也进行了以研究生为主，到以培养学科带头人和博士研究生为主，以中青年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短期进修为主的频繁调整。这些人的绝大多数，都成为了学术、科研等各个领域的引领者和重要贡献者（缪琦，2022）。大量的中国青年都想赴美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公派留学名额已经不能限制中国大量年轻人的需求了。所以在这个时期，扩大公派的同时，自费留学也已放开。不过，自费留学热一直到 1985 年我国取消“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乃至 1993 年自费出国渠道彻底放开后才真正迎来高潮（缪琦，2022）。

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后对中国人改变最大的则是价值观和社会生活方式，美国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开始影响部分中国年轻一代。美国的自由、民主理念通过文化传播渠道在中国获得关注，但这些西方价值观的接受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尽管美国文化的影响巨大，但也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反思和文化保护意识的增强。一些学者认为，过度接受美国消费文化可能导致文化认同的危机，但是西方文化作为彼时的“先进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力量让中国几乎全盘接受西方化，这是由于西方文化产业对世界市场的支配力，西方消费大众文化对非西方社会的支配力（姜明求，2001）文化帝国主义不仅威胁着各社会的文化连续性，反而对文化上完结的过去这一我们的总体想象物感到危险。Tomlinson 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不仅威胁到文化的连续性，更威胁到对过去的想象形象（Tomlinson，1991）。这导致了对近代性的批判，也为理解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扩张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提供了重要启示。美国文化通过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时尚和快餐品牌等，在中国大城市中迅速扩展，尤其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消费习惯和审美偏好。它还引入了个性自由、个人主义等西方价值观，使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生活方式产生向往。

通过将文化帝国主义视为近代性的扩散，可以避免这些文化帝国主义的局限问题。因为这个扩散的过程不是文化强制的过程,而是文化丧失的过程。如果单纯地将文化视为世界市场上的文化商品的流通,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将仅限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讨论设定的问题。因此，构建不陷入错误文化意识的一个批判性理论体系将变得困难。但是，如果把文化看成是人们表现自己、创造社会意义和目的的资源，就可以实现完全不同视角的转换（第 173 页，姜大仁，第 298 页）。为应对美国产生的文化帝国组合以影响，中国采取了多方面的策略。首先推动中国本土文化发展，通过发展国内电

影、音乐等文化产业，加强原创内容和民族文化的传播，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毕竟美国和中国的国家体制不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仍存在差异，所以加强了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综上所述，在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外来文化的影响进行了第二轮的文化受用过程，这个时期这种文化受用方式是通过市场化和个人自主选择的方式，尤其在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上借助大众媒体和商业渠道进行广泛传播。这个时期文化受用的特点是具有主动性，追求少部分人才的精英化，无限制的，以资本主义国家思想为中心的。

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受用时期

随着中国与东亚邻国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特别是 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建交、1992 年 8 月 24 日中韩建交，经过长时间的交流之后，中日韩之间的关系改善，东亚文化（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开始对中国的年轻一代产生影响。韩国流行文化（K-pop、电视剧）以及日本的动漫在中国的流行程度尤其高。

其实中日韩三国之间自古以来一直在进行国家间的交流。一千多年前唐朝时期，造船与航海技术低下，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历尽艰辛东渡日本。鉴真东渡为了向日本传递佛法，使得日本和中国的文化联系至今稳固。韩国更是自古以来作为中国的邻居，政府和民间的交流更是频繁，所以现代中日韩之间交流以来并不陌生。但是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交流方向和古代并不一样。在古代封建时期，中国作为东亚的大国，向周边各国进行全方位的文化传播和势力扩散，文化交流也以中国为中心，向周边国家传播儒学、佛教、书法、建筑等先进技术。唐代时，日本和韩国派遣使者学习汉字、制度和文化，形成了汉字文化圈。近代化时期，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福泽谕吉一直致力于将亚洲的“落后”文化转变为西方的“先进”文化，以此塑造“脱亚入欧”的自我形象。在此过程中，日本没有和韩国、中国等一起创造东亚固有的认同感，而是开始否定这一理念，并努力走向西方（姜尚中，1997）。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开始向西方学习并“脱亚入欧”无疑是成功的决定。日本也奠定了日后成为强国的基础。随着西方列强进入亚洲，三国面临现代化压力，分别进行学习和改革，因为在东亚，西方文化是具有发展性的“近代文化”，地区文化被认为是落后的“传统文化”。东亚三国韩国、中国和日本根据各自的社会发展阶段，接受西方文化，追求社会发展。例如，通过近代初期的中国“中体西用论”、日本的“和魂良才论”、 韩国的“东西方器论”等概念，试图在维持东方精神文化的同时接受西方文化（崔英默，2004）。日本迅速转变学习的目标，将文化流动方向转变为西方先进国家，从而实现日本的快速现代化，日本大众文化超越了日本的东方主义亚洲概念等，以更加多样、不均衡、矛盾的方式与亚洲国家见面。想要成为亚洲中心的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不平衡的关系仍然是不可否认的（Iwabuchi,2001）.

在如今，百废待兴的中日韩三国之间文化交流加速，在影视、音乐（如 K-pop、动漫）、饮食等流行文化上有密切互动，同时也推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日本的动漫、游戏、文学、电影等文化形式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对中国青少年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日本的“二次元文化”对中国本土的动漫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起到了催化作用。与此同时，日本的工匠精神和精细管理模式也影响了中国的制造业和企业管理。

自 2000 年后，韩国的流行音乐、电视剧、美妆时尚等迅速风靡中国。韩流（Korean Wave）文化影响了中国的娱乐产业和时尚潮流。韩国的综艺节目模式也被中国电视台大量借鉴，推动了本土娱乐节目形式的多样化，2013 年韩流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也是标志着韩流在中国达到了顶峰的事件。

东亚的饮食文化，尤其是日式、韩式料理也逐渐成为中国都市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日料店、韩餐馆在各大城市普及。迄今为止，文化的国际流动是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或周边国家的单方面流动，而东亚文化交流是随着日本、香港、韩国等在亚洲成为沟通和文化生产的新主体，主导地区内文化流动的最新现象（金秀晶,梁银敬,2006）。金秀晶和梁银敬提出这种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能与儒家文化的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相关联。但是在后面的研究中探索用“混合性”概念代替儒教文化接近性的可能性，提出混合性可以通过传统和近代、西欧和亚洲的混合来理解东亚文化流通和韩流(金秀晶,杨恩京,2006)。日韩文化已经不再是中国人记忆中落后的周边小众文化，而已经成为了，与近代的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以及保留着传统东亚文化的新兴“混合文化”，混合性也是以跨国资本或民族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大众文化消费层为目的的文化生产战略的主要产物。具体来说,作为这种地区化战略的一环,作为扩大市场等创造综合利益的方式,国家间或地区间文化产业主体之间的合作品(coproductions),以及模仿其他国家的广播节目或借用节目形式,在各种文化中主要批量生产出混合性(Kraidy,2005)。

通过在东亚交流的多种大众文化消费形成的混合性,因其包含的多层次性,有可能改变现有的权力格局。另外,传统、近代和发近代的价值混杂在一起,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生活面貌在复合的大众文化形式和体裁中再现,相互交流,在生产和消费的脉络下,共享同时代文化的混种经验,打开新的理解视野。（金秀晶，杨恩京，2006）。

由于东亚文化国家之间存在着文化接近性加上日韩文化自带的文化混种性，让中国的东亚文化受用变得更加容易，而且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已经受够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思想理念的统治，认为美国或者是西方文化就一定是对的，是先进的。中国国内也加强了民族文化教育，比起和中国人传统价值观有差异的西方近代文化，许多年轻人宁愿选择更加接近更加偏向东亚审美审美观和价值观的东亚文化.在之前的研究中显示，以日本家庭主妇对于韩流文化的受用情况为例子，比起接受外国文化带来的“快乐(pleasure)”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更接近于一种“训练或学习(discipline or learning)”在近代化过程中，这种学习的痛苦也被视为成为近代市民的必要过程，但现在比起学习他国文化的痛苦，更重视接受文化的“快乐”（李昌贤，2006）。这也

就非常符合之前所提到的脱近代化的文化的受用过程。世界格局的改变，“脱亚入欧”在今天也慢慢变成了，脱欧入亚。这种又日韩领导的脱近代化文化交流过程是多中心指向的，追求文化多样化和文化平等。这是一种多重的文化流动，东亚文化圈成为文化流动的中心，追求双方的交流，并且受用者也是具有主动性(李昌贤，2006），这与美国文化受用时期的中国受用者的特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即使东亚文化对于中国有着文化接近性和混种性的优势，但是在中国的受用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首先一点是历史遗留问题。比如日本在近代对于中韩两国的残酷侵略，这让中韩两国人民每每想起都深恶痛绝。中韩之间的情况，又存在着许多传统文化认同和节日归属的问题，脱近代化的东亚文化往往强调本土性和传统价值观，但中国自身传统文化复兴的意识也很强，容易导致对他国文化认同的抵触。这些问题经常登上两国的热门新闻话题，每当这时候，两国民间的舆论就容易偏向对立的情绪。第二点则是中国国内对于民族文化自信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倡导文化自信，强调自主创新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脱近代化东亚文化的全面接受形成局限。这时中国以网络为中心，抗韩流以及反韩情绪也渐渐的产生了。随着网络的发展的和中国渐渐再次成为世界强国，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力量，而这股力量也成为了抗韩流以及反韩情绪最大的支持者（申英美，2011）。韩国学者韩银敬（2017）认为，“反韩流”的原因有:第一，不均衡或单方面的韩流传播；第二，保护本国文化产业；第三，丧失韩流文化产品本身的竞争力等；第四,考虑到韩流是国家与国家的交流形成的副产品,国家间政治、社会层面也应该考虑反韩流的原因。随着中国网络的发展,韩流(韩国电视剧,K-POP)在中国也能广泛传播,一度对中国的话题和新闻都充满对韩流关注的中国网民非常厌烦,每天看到的只有韩流的信息,中国网民们开始警惕中国网络舆论环境是否过于专注于讨论韩流,对本国话题漠不关心。再加上“萨德”（THAAD-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和文化所属争议，韩中关系日益受损，中国网民的反韩情绪扩散。

随着“萨德”的设置和韩流文化渐渐的对中国国内文化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2016 年 7 月颁布的”限韩令”更是给了韩流在中国传播带来了重大的打击。并且大多数的中国网民表示理解和支持“限韩令”在中国的实行，在先行研究中，中国网民在评论中支持“限韩令”，第一是担心中国国内的经济保护问题，第二是担心韩流的社会影响力，第三个原因是不满低质量的韩流内容，第四个原因是“萨德”的部署。这四种支持类型也与韩银敬（2017 年）整理的反韩流原因一致。一方面,反对“限韩令”的第一个理由是对劣质国产内容不满，第二个理由是对文化控制的担忧。像这样作为决策者的政府、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媒体和网络上，对同一话题持有不同的意见（李昌贤，李德顺，2017）。但是中国大部文化受使用者也表现出认可政府“限韩令”的态度,另一方面也高度评价了韩流的优秀性，特别是韩国电影的优秀性。同时,在职业专业性、节目完成度方面，韩国艺人更加出色。另外,让调查对象比较中国的文化产业和韩国的文化产业,大体上对韩国文化信息及与此相关的从业人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对于韩国电影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功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对于中国电影的评价却

很低。（李昌贤，李德顺，2017）。这表明，中国人从政治角度支持并理解“限韩令”，但从文化角度，却把本国的文化产品市场视为反思自己的机会。这暗示着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已经赶不上韩流,不能再仅以中华为中心思想来理解全世界了。

研究问题

RQ1.新中国接受苏联文化时期的文化接受方式、特点、局限性有哪些？

RQ2.新中国接受美国文化时期的文化接受方式、特点、局限性有哪些？

RQ3.新中国日韩文化收纳时期的文化收纳方式、特点、局限性有哪些？

研究方法

想要研究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决定研究的特定时期。文化受用时期需要到达一个共识才能进行研究。根据时间线，新中国的文化受用最初是接受苏联文化时期，这大概在 1949 年开始到 1969 年结束中苏之间由于珍宝岛战争正式宣布中苏关系破裂这一段时间。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与苏联的紧密政治联盟，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深受苏联的影响。在此期间，中国大量引入苏联的文学作品、艺术形式、教育体系和意识形态。

1978 年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交流迅速扩大。美国的流行音乐、影视剧、快餐文化和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城市中风靡一时。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到 2000 年这一时期，中国社会逐渐接受了市场经济观念、个人主义和多元文化的理念，美国文化的输入对中国青少年的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入 21 世纪后，也就是 2000 年到至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的流行文化在中国崛起。例如，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剧和 K-POP 音乐在年轻人中备受追捧。中国社会在接受这些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亚文化”群体。

数据收集

为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数据将从多种渠道收集，主要包括两类资料作为文献支持，第一类是政策文件，收集政府档案、教育和文化政策文件。政策文件和官方文献通常由政府或权威机构发布，能够全面反映某一时期国家在文化接受方面的态度和战略。这些文献是国家层面决策的直接体现，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在研究外来文化接受的问题上，政策文件能清楚展现政策导向和文化输入的管理方式，如“中苏友

好条约”或中美建交文件中反映的文化交流策略。政策文件和官方文献往往贯穿不同历史阶段，能为研究提供跨时段的分析框架。比如，不同阶段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和类型的转变都可以通过政策文件来追踪。相较于社交媒体评论等具有较强个体偏向的资料，政策文件的措辞和内容更为正式、规范，适合进行系统性的内容分析，且可以减少主观性干扰，提高研究的客观性。

第二类是中国官方媒体的新闻报道，《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官方媒体之一，其报道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政府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和政策导向。收集关于新中国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化交流，报道突出中苏友好，强调苏联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上的先进性。如报道苏联电影的上映或高尔基作品的翻译传播。人民日报配合当时政策，宣传苏联教育体制、文学艺术以及技术对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影响。《人民日报》常刊载关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系列文章，呼吁全国学习苏联模式。报道中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团结，同时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尤其是美国的“颓废文化”）。

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的报道逐渐多样化，体现了对美国文化既开放又警惕的态度。报道更多关注美国文化的先进技术和经济价值，但对其价值观输出持谨慎态度。随着中美建交，报道开始介绍美国文化的特点，如好莱坞电影、摇滚音乐和消费文化等。1980 年代关于肯德基和麦当劳进入中国市场的报道，常以“现代化的象征”或“消费文化的新潮流”进行描述。强调美国在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领域的优势，如对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报道，突出“引进先进科技为国服务”。报道美国在全球化中的领先地位，但回避过多讨论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人民日报》对美国文化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有所批评。例如，美国大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崇洋媚外”现象的潜在隐忧。

进入 2000 年以后，报道既呈现日韩文化的影响力（尤其是流行文化），也强调文化安全与民族文化自信的平衡。在“韩流”和“日潮”流行的背景下，政府通过媒体加强舆论导向。在中日韩建交初期，报道多为积极合作的内容，例如文化交流活动、影视作品的互相传播等。报道中描述韩流、日本动漫等流行文化的快速传播，例如 K-pop、韩剧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以及日本动漫电影在中国市场的成功。《人民日报》多次报道“韩流”音乐会或日本动漫展览，引发年轻观众追捧的场景。在韩流、日漫流行后期，《人民日报》逐渐增加对文化保护和“限韩令”相关政策的解读，强调防止文化安全受到外来文化过度影响。报道萨德事件后，中国对韩国影视音乐的限制，常以维护文化市场秩序和国家利益为由。

关键字与框架

在研究初期,在没有事先设定的编码框架的情况下,逐字阅读文本,并标记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关键词及句子。例如，不同时代的文化接受方式可分为政策驱动型、市场驱

动型和流行型。政策主导型关键词可以标记为“政府推进”、“文化政策”、“政策支援”市场主导型关键词可以标记为“消费者需求”、“商务娱乐”、“市场营销”大众流行型关键词可以标记为“日照”、“ 韩流”和“偶像文化”。

文化接受特征将“集体主义”和“意识形态”列为苏联的文化特征，将“自由主义”和“个性化”列为美国的文化特征。“偶像崇拜”、“时尚潮流”、“电影、动漫宅”被选为韩日文化的特征。从局限性方面来看，“文化冲突”、“去政治化”、“审查制度”、“限韩令”、“保护本国文化”被归类为文化政策的局限性。最后进一步提炼所有编码，选择与研究问题密切相关的关键类别。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可采用三角验证法验证研究可靠性。三角验证法是将不同的数据源和理论观点整合在一起，对研究结果进行交叉验证的方法。首先，使用不同的数据源来验证相同的现象，以确保信息的全面性和多样性。通过对多渠道数据的交叉验证，可以避免单一数据源的偏倚，从而提高结论的可靠性。其次，用不同的理论观点描述研究现象，使结论不基于单一的理论框架。例如“意识形态控制理论”被用来分析苏联时代对文化收入的政策指导特征以及文化政策对接受外来文化的限制。“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用来描述美国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和对中国市场的渗透。文化混合理论(Cultural Hybridization Theory)用于理解韩日文化在中国市场本地化的过程和社会适应机制。这有利于减小偏差，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通过数据来源和理论的交叉验证，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新中国不同时期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方式、特征和局限性，从而为后续的文化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研究结果

苏联文化接受时期（1949-1969）

政策导向型为主:通过政府政策和制度的推动，引导人民接受特定外来文化。新中国初期，国家运用政策主导文化引进，特别是在苏联文化接受期间（1949-1969 年）。引进苏联教材、教学法等苏联教育系统，派遣大量留学生到苏联。在艺术上，模仿苏联的文学作品、戏剧和电影，如《列宁在十月》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政策具有通过文化“学习”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的意图,非常主导性。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文化接受度比较单一，缺乏多样性。通过政府高层的协定和政策，促进苏联文化的引进。例如，《中苏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和《中苏文化合作协定》明确两国在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合作。教育领域采用苏联教科书，引进五年计划管理模式等苏联模式。艺术领域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风格。《人民日报》的报道重点介绍了两国的友好合作和文化成果，强调了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电影和戏剧的广泛宣传等理念上的共同点。苏联文化被打造成引导中国社会接受集体主义和劳动英雄价值的

“社会主义模式”。《人民日报》多次强调苏联文化在苏联文学经典书评、剧评等思想教育中的作用。

然而，对单一文化院的过度依赖和僵化的模仿，暴露了接受苏联文化的局限性。苏联文化的接受是封闭的，与其他外国文化隔绝，无视当地文化需求。在教育与艺术上，模仿苏联模式限制了地区创造力的发挥。例如，在戏剧和文学领域，内容多为机械化的政治宣传。场地驱动的文化接受方式更加灵活，但可能导致过度商业化和文化深度不足。此外，市场需求的多样性也促进了地方文化和外国文化的融合。

美国文化接受时期(1978 年-2000 年)

通过市场力量促进对外文化的接受，主要依靠消费者需求和市场反馈。这种方式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 1978 年以后，随着美国文化的流入而更加明显。好莱坞电影和快餐文化（肯德基、麦当劳等）迅速进入中国市场，以娱乐性和商业化吸引了大量中国消费者。改革开放以来，中美文化交流加速，《人民日报》报道了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麦当劳等众多美国电影和流行音乐进入。虽然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美国产品的管制，但正如《人民日报》报道的那样，政府强调文化上的“谨慎引进”。美国文化通过市场的力量，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中形成“个性化”和“自由主义”倾向有很大影响。娱乐行业发展迅速，人民日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美国流行文化的报道从批评转向客观解释。

文化冲突与本土化、过度商业化在美国文化接受时期同样出现。自由主义文化与中国的传统集体主义发生冲突，例如好莱坞电影的个别英雄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立，在人民日报文章中多次被提及和批评。外国文化产品消费迅速，文化内涵可忽略不计。例如，在美国快餐文化的传播中，一些学者认为它对健康和传统饮食习惯产生了负面影响。

韩日文化接受时期（2000 年至今）

依靠社交媒体、年轻文化和粉丝群体促进外国文化的传播，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尤其是日韩文化的流行。K-POP 音乐、韩剧、日漫等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微博、哔哩哔哩等）在中国年轻人中迅速流行，形成了独特的粉丝群和亚文化现象。这种文化收入依赖自上而下的普及，接受度高，尤其受年轻人欢迎。但是在文化接纳过程中还会介入韩流文化信息审查等国家政策。韩剧、日本动画、K-POP 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迅速传播，深受年轻人喜爱。例如，《人民日报》报道了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在中国掀起的热潮，关注了文化影响力。日本漫画粉丝团、K-POP 粉丝团等亚文化集团逐渐形成。外国文化在娱乐领域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如日本和韩国的音乐、时尚和影视作品已成为年轻人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今天政策限制和文化敏感性和亚文化分化的风险仍然存在。2016 年“限韩令”之后,韩国文化内容的传播被严格审查,日本文化也因历史问题而敏感,部分领域的

交流受到限制。《人民日报》多次强调外国文化的“针对性”，呼吁加强对年轻人的文化引导。一些日本韩亚文化会引发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疏离，比如沉迷于外来偶像和时尚，忽视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价值。

分类	外国文化受用方式	外国文化受用特征	限制与缺点
苏联文化接受时期（1949-1969）	政策主导性：通过政府政策和制度，对投入苏联时期的教育方式，苏联教材课文，以及苏联时期的学习方法	团体意识 无产阶级理念指导 对于苏联艺术形式模仿（戏剧，文学作品）	由于过于强调集团主义和团体意识，抹灭个性和创意 由于政策限制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封闭彻底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立
美国文化接受时期(1978 年-2000 年)	市场主导型：依存市场和消费者需要，通过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以及快餐文化进入中国文化市场	自由主义 个性化，重视自我 商业性娱乐文化渗透	商业流行文化导致文化氛围肤浅和浮躁 政务审查及政策控制对文化出口的影响
韩日文化接受时期（2000 年至今）	大众主导型：通过社交媒体以及青少年传播，K-POP,日本动漫，以及偶像文化	偶像崇拜 青年人引领穿衣时尚 亚文化（非主流）/小众文化群体形成和扩张	韩流和日本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并引起“文化起源纠纷” 外来文化的迅速流行导致对本国文化关心流失严重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新中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苏联文化接受阶段（1949－1969）、美国文化输入阶段（1978－2000）以及日韩文化扩散阶段（2000 年至今）——的文化接受方式、特征与局限性的深入考察，揭示了中国在特定政治经济背景下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接受机制及其演变路径。通过政策文件与主流媒体《人民日报》文本的系统分析，并辅以意识形态控制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及文化混合理论的多重视角支撑，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新中国建国初期至 1960 年代末的苏联文化输入，是在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展开的文化移植过程，具有高度政治性、集中性与计划性。这一时期的文化接受方式以国家政策推动为核心，通过制度化的引导路径强化中苏之间的社会主义文化同盟。

《人民日报》的大量报道集中展现了以教育、文学、电影为主的苏联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制度性嵌入过程。然而，这种政策驱动型文化输入模式也显露出其结构性的局限：文化形式趋于单一、创造力受限，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本土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 1978 年至 2000 年间，美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逐步脱离了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转而依赖市场机制与消费逻辑进入大众生活。在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快餐品牌等文化产品的带动下，美国文化通过娱乐消费渗透至中国社会的多个层面，尤其在青年文化认同与生活方式上产生深远影响。人民日报报道在逐步放松审查的同时，表现出对美国文化中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倾向的警觉态度。市场导向虽提升了文化选择的自主性，却也带来了文化娱乐化、浅层化和价值观冲突的问题。例如，美式英雄主义与中国传统集体主义之间的张力在媒体话语中多次被指出，反映出文化输入过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21 世纪以来，日韩文化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以粉丝文化、二次元文化等形态迅速传播，并形成以网络社群为中心的“亚文化”现象。这一阶段的文化接受机制更加去中心化与去制度化，呈现出高度流动性和社群驱动的特征。《人民日报》的报道从积极评价文化交流逐步转向强调文化安全与价值观引导，反映出在日韩文化热潮背景下，国家对文化舆论场和青少年认同的高度关注。尽管日韩文化的输入带来了形式与内容上的多元创新，但也伴随着文化保护主义的抬头、政策干预的强化（“限韩令”）及文化认同的焦虑等问题，显示出全球文化流动在中国语境下仍受制于国家战略与意识形态边界。

综上所述，新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经历了由政策灌输型、市场调节型到网络社群型的阶段性演变。文化输入路径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在国家治理逻辑、社会结构、传播技术变迁背景下的文化调适策略。从国家控制到市场选择再到网络协商，文化输入逐渐脱离单一主导，向多元协商机制发展，但始终伴随着对文化主权、社会价值观与身份认同的制度性关注。本研究所揭示的外来文化接受逻辑与其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展现了国家权力、市场机制与社会认同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交错的动力结构。通过意识形态控制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与文化混合理论的交叉应用，本研究不仅实现了对历史语境中文化输入机制的系统复原，也为今后中国文化政策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李扬帆.未完成的国家:"中国"国名的形成与近代民族主义的构建[J].国际政治研究,2014(5):25.DOI:CNKI:SUN:GJZY.0.2014-05-003.

李金花.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与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41(10):173-179.

高培业.(1998).中美社会文化差异对会计文化的影响(Doctoraldissertation).

缪琦.从“上海”启程：赴美留学 50 年[N].第一财经日报,2022-03-01(A01).DOI:10.28207/n.cnki.ndycj.2022.000906.

Giddens,A.(1999)"Comment:the1999Reithlecture.Newworldwithoutend",Observer,April11.

Tomlinson,J.(1991).CulturalImperialism(Baltimore:JohnsHopkinsPress).

Kraidy,M.M.(2005).HybridityortheCutluralLogicofGlobalization.PA:TempleUniv.

Press.

김덕호.(2005).냉전초기코카콜라와미국문화산업의세계화.미국사연구,21,105-140.

이창현.(2005)"NortheastAsiaCommunicationsSymosium,2005:東北亞的文化交流"

강명구.(2001).지구화와민족정체성.방송과커뮤니케이션,,113-138.

강상중.1997.『오리엔탈리즘을넘어서』서울:이산.

이종하,이미정.(2006).문화의세계화,그리고‘한류’.언어와문화,2(1),191-206.

이와부치고이치.2001.「아시아를잇는대중문화』서울:또하나의문화

이와부치고이치.2004."일본대중문화의이용가치초국가주의와사이아에대한탈식민적욕망"조한혜정외 4 인,『'한류'와아시아의대중문화』서울:연세대학교출판부,pp.87124.

백원담,이보경,백지운,박자영,신현준,이동연,and 최영묵.동아시아에서대중문화교류에관한성찰적연구.NRFKRM(KoreanResearchMemory),2003.

김수정(SujeongKim),and 양은경(Eun-KyungYang)."동아시아대중문화물의수용과혼종성의이해."한국언론학보 50.1(2006):115-136.

김수정,김은준.(2015).해외언론인의한류에대한인식및혐한보도연구.한국언론진흥재단.

홍주현·이창현(2011).중국의인터넷포털게시판댓글의파동분석.“사이버커뮤니케이션학보”,28(2),99～147.

한은경(2005).한류의소비자지각상경제적파급효과. 한국방송학보 ,19(3),325～360.

신영미."중국내반한정서(反韩情绪)의현황과동인(动因)－
인터넷공간을중심으로."중소연구 34.4(2011):107－138.

이창현,and 리더쑨."중국의 '한한령(限韓令)' 에대한한국내중국유학생인식에대한
연구."주관성연구－.38(2017):81－101.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eign Cultural Recep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Its Founding: Focusing on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People's Daily

Qimeng Dang[1]*

[1]*School of Communication, Kookmin University, South Korea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atterns of foreign cultural reception in China across three distinct historical period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fficial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reports from People's Daily,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how China's mode of accepting foreign cultures has shifted from being centered on the Soviet Union (1949–1969), to being dominated by American influences (1978–2000), and finally to the current stage characterized by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East Asian countries (2000–present). The study employs content analysis of two major sources of data: (1) government policy documents, and (2) People's Daily reports spanning over seventy year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is based on a triangulation methodology, incorporating multip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Ideological Control Theory, Cultural Imperialism Theory, and Cultural Hybridization Theory, to ensur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Key coding categories were developed to identify the reception patterns,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of foreign cultures in each historical period.

Keywords: *foreign cultural reception, cultural accommod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imperialism, cultural hybridization, cultural proximity*